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执政党建设的 中国逻辑

宋福范◎著

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进性
执政理念

党的发展历程和党的自身建设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执政党建设的 中国逻辑

宋福范◎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编委会

总主编 陈宝生

副主编 马建堂 杨克勤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怀德 王满传 邓纯东 刘峰

刘建飞 吴江 邹东涛 张小劲

张文魁 张占斌 张仲宇 张春生

陈炎兵 邵景均 侯少文 郭建宁

自序

承蒙出版社之约，笔者整理了这些年来撰写的党建研究成果，以《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为题出版，希望此书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之所以以《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为题，盖因为从笔者踏入党建研究领域始，所涉猎的全部问题，皆属对执政党建设中国逻辑的探讨。因而，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可以较好地概括本书的主题。全书所有篇目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是对这一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回答。有鉴于此，又因为所选篇目中设有就此主题专门进行阐述的文章，所以借此机会，笔者集中谈一下对此问题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当代中国学者研究视阈中的党建问题，尽管从不同学科、不同方向、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全部工作落脚到最后，其实都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因为受这一规律导引，才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局面。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只有真正把握了这些规律，自觉按照这些规律办事，才能有助于解决当下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真正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把握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规律，需要确立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是任何其他别的政党的建设，其他政党自身建设的一些好的做法，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供借鉴，但是无法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所面临的独特矛盾和问题。这是因为，虽然从应然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应该遵循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现代政党作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毫无疑问，欧美发达国家的

政党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现代政党自身建设的某些方面也确实走在了前面，因而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主要参照对象，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毕竟这些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种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就这点而言，它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并无区别。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不应该仅仅从欧美发达国家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经验中去寻找，而应该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在内的所有的个性中去进行提炼和概括。把欧美发达国家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笼统地看作是一般规律，不是一种完全科学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使自己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完成历史任务，明确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一命题。推进这项工作，没有其他任何别的政党的规律可以遵循。而这项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只有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自身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去寻找。执政以来，当党的建设进程进展得比较顺利的时候，说明比较好地顺应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而这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党的建设的经验；当党的建设进程推进得比较曲折的时候，说明违背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而这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党的建设的教训。无论经验和教训，都在正反两个方向上向我们展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应当把握的基本法则。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刻地总结了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六条基本经验，以此作为新时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基本遵循。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理论逻辑的深刻认知。实际上，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全部思路，都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笔者认为，把握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关键在于把握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因为正是在党的基本特点里面，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全部规律。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知，对自身的基本特点也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中国大陆地区唯一、长

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中国大陆地区唯一、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蕴含着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党；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四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五是，长期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六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等。上述每个特点都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它们共同决定并承载着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比如，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政党从应然的意义讲，是民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就在于它有着普通民众所不具有的鲜明特点和优势，即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的基础首先就表现为它的组织性。组织，作为分散的个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凝聚起来的有机整体，之所以能够解决普通民众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于它能够凝聚全体成员的意志和力量，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谓“心往一处想”，指的是全体组织成员在组织存在发展的基本问题上凝聚起了高度共识，形成了共同意志，构筑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所谓“劲往一处使”，指的是全体组织成员形成了服从被服从的关系，建构了严密的组织体系，保证了行动和步调的高度一致。在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所讲的思想建设，所要解决的就是“心往一处想”的问题；而组织建设，所要解决的就是“劲往一处使”的问题。

再比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发展的规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民众因为掌控生产资料的多寡而划分为阶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宣告，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即它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所不同的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是人民群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因而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尽管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作用，但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意味着，不管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先进和重要，它的本质，从应然的角度讲，只能是人民群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自身建设必须以此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党是人民的工具”，因此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之源。我们通常所讲的党的作风建设，实质就是帮助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确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观，以使党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守党是人民群众工具的本质。

又比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存在发展的规律。执政党的最大特点，即掌握了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使一个政党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更广阔的平台，可以使一个政党及其成员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政治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彰显自己的政治价值。但是，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强迫别人服从的力量。这对一个政党及其成员都有着强大的腐蚀作用。正因为如此，早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醒全党牢记“两个务必”；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也明确提出，在中国，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大。掌握国家政权，意味着我们掌握了一把切分财富的大刀子。一旦管控不好，又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使我们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危险。我们通常所讲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就是要适应执政党的特点，使党经得起执政考验拒腐防变，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党在执政条件下蜕化变质。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

还比如，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存在发展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所必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巨大考验。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集中反映了在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一基本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层动因和道理所在。

本书的文章，选自20世纪90年代我本人从事党建理论教学和科研以来，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的党建论文，共计有30多篇。基本上体现了笔者对新时期执政党建设中国逻辑的基本看法。论文涵盖两个大的领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笔者一直认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党的建设，只有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来审视，才会有一个较好的站位。这能使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上，同时也能够从一个比较深的深度上思考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问题。所选文章，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体定位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也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所选文章基本涉及到党的建设的所有板块。既有对党的建设历程的回顾，也有对党的建设总体性的研究，还有对党的建设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的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文章发表时间较早，尽管我对个别文字做了一些修订，使其更加体现执政党建设中国逻辑的历史发展，但是因为它体现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所以也未做大的修改，每篇文章还是能够看出当时时代的痕迹。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弄清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复杂，再加上时代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在本书中，笔者对这些问题也只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欢迎关心这个问题的同行和朋友批评指正！

宋福范

2017年5月于中央党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目录
CONTENTS

- ◇ 整体性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001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015
- ◇ 厘清党的基本路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 027
- ◇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 / 033
- ◇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 038
-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 043
-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行动指南 / 050
- ◇ 《江泽民文选》十大创新用语 / 058
- ◇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及依据 / 063
- ◇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宏观理路 / 074
- ◇ 习近平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的基本逻辑 / 089

- ◇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 / 095
- ◇ 党的发展历程与党的自身建设 / 099
- ◇ 毛泽东思考党建问题的方法和启示 / 106
- ◇ 从时代高度认识邓小平党建理论的贡献 / 111
- ◇ “三个代表”与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 / 117
- ◇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建设 / 125
- ◇ 认知党的执政规律的基本方法 / 132
- ◇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 / 137
- ◇ 正确把握党的执政理念的科学体系 / 146
- ◇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念 / 150
- ◇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157
- ◇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 163
- ◇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 / 168
- ◇ 党的先进性的时代特征 / 173
- ◇ 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命之魂 / 177
- ◇ 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理论逻辑 / 186
- ◇ 论共产党员先进性 / 196
- ◇ 以“三个代表”为指针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 203
- ◇ 论刘少奇扩大党内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211

- ◇ 正确把握规律才能实现组织工作科学化 / 220
- ◇ 应在组织规律框架内认知党内民主 / 224
- ◇ 把握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 / 228
- ◇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逻辑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 230
- ◇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深刻启示 / 243
- ◇ 从战略上把握现阶段我国腐败的基本特点 / 250
- ◇ “四不贪”机制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启示 / 258

参考文献 / 263

整体性视阈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开创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解释和说明，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路径等问题所作的系统阐明。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1] 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必须从整体性的视阈来理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的中心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所承担的使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课题。近代以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2]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多年来，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作为对这一道路系统解释和说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 年 7 月 1 日），《胡锦涛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26 页。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20 页。

论体系逐渐形成并渐次展开，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并长期领先世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在此之后，中国逐渐衰落，沦为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境遇的巨大反差，极大地激发起一代代先进中国人奋起抗争以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意志，从那时起，他们开启并延续着艰苦卓绝奋斗以挽救民族危亡的艰辛征程。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民族复兴的愿景值得期许，奋斗历程则是异常艰辛。在人类已经步入新文明的时代，通过振兴已经过气的农耕文明，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强盛。这是因为，自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西欧国家率先告别封建专制制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告别落后的农耕文明，进入先进的工业文明。之后的东西方两种文明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一边是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一边是农业文明的停滞不前。而鸦片战争，可以看作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撞。结果是，先进文明胜利了、落后文明失败了。此后中国每况愈下的悲惨境遇表明，古老中国要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重现昔日的辉煌，就必须在世界新文明坐标系中重新定位，承认落后并奋起直追，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意味着，实现民族复兴，实质是以追赶西方、超越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从技术形态看，要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乃至更高级的信息文明或生态文明转型；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要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在国家管治方式上，要告别专制人治，向民主法制转型，等等。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实质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由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和20世纪上半叶国际国内大势所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以社会主义为指向。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试图不变更封建专制制度，通过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实现现代化，其结果是，虽然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但由于专制制度的

腐朽没落，没有阻止国家沦落的势头。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改弦易辙，开始探索以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指向的现代化之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的办法，部分变更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最终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通过暴力革命的办法，彻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也仅仅是推翻了一个封建皇帝，没有建立起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社会秩序，最终导致军阀混战的乱局。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失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社会主义成为必由之路。就世界大势来说，曾经作为中国人学习榜样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策动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梦。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把迷茫中的中国人导向了另外一种新前景。中国共产党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一种前途，这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社会主义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美苏争霸、两极对立的格局下实现的。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们只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以单一的国有制作为主导，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政治体制方面，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终身制、家长制、个人崇拜，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忽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思想文化上，斯大林解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尽管在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背景下，这一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也曾推动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其割断发展经济与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致命弊端，导致人们最终丧失生产积极性，这一后果在实践中很快显现。我们曾经努力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把那些并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固

守，这使我们的探索陷入迷途，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沉重灾难。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成为时代交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创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重任。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这一课题的实践路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这一道路的系统解释和说明。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目标路径作出系统的理论阐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回答的中心课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承载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持续的接力探索，开创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各个历史时期阶段性的系统解释和说明，它们的逻辑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目标和路径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1. 开创之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解释和说明。它立足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生存型阶段实际，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路径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的系统阐明。

邓小平理论产生于“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为从苏联模式造成的重大失误及其严重后果中走出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实质就是改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明确地定位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路径定位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通过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根本任务、政治保证、根本动力、基本方针和主要目标等问题的明确概括，党的基本路线首次清晰规划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路径。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苏联模式为蓝本所形成的现代化道路相比，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揭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基本规律。由于邓小平理论是对这一道路的系统解释和说明，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之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通过审视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路径问题的探索，实际上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反复追问开始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路径问题。不从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中走出来，就无法重启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回答了这两大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摒弃了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从体制方面所作的片面理解，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纯而又纯的国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的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

[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1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